

王陽明的生活世界

通往聖人之路

修订版

董平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董平 著

王陽明的生活世界

通往聖人之路

修訂版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阳明的生活世界：通往圣人之路 / 董平著. —修订本.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ISBN 978 - 7 - 100 - 15608 - 0

I. ①王… II. ①董… III. ①王守仁(1472-1528)—
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248.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97579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王阳明的生活世界——通往圣人之路
(修订版)
董 平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5608 - 0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8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3 1/4

定价：48.00 元

导言

宋代理学的兴起与繁荣，作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一次哲学运动或思想文化运动，其最终结果是重新追回了作为传统文化之核心支柱的儒学道统，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其内容的创造性更新及其价值的创造性转换。“道统”的意义，与其说是关于儒学传统之历史事实的理论还原，毋宁说是关于以孔、孟为典范的儒家文化理念的价值抽象，它所体现的并不是历史事件的真实，而是关于历史文化传统之理解的“价值真实”。正是这一关于中国文化之核心价值的根本理念，成为理学或道学这一儒学复兴运动所立足的基点，成为其中坚人物所共同体认到的中国文化自身的“本体”，因而也成为抗御两晋、南北朝、隋、唐以来佛教、道教文化的强势繁荣甚至于思想界垄断的思想防线。理学的最终成就表明，它在充分理解、深刻领会、融摄参贯佛、道之思想精髓的前提之下，实现了对佛、道之思想世界及其价值论阈的成功消解。而基于新的理论视阈与经典意义的重新诠释，理学同时也实现了对于儒家古典哲学系统的重新建构，进一步拓展了其思想

空间，从而使其思想生命得以返本开新。这一儒家哲学的古典新义，不仅在理论上或思想上充分回应了以佛教为典范的宗教哲学的形上之思，而且在实践上重新追回了圣人人格的古典理想。在“圣学”的视阈之下，由于存在的本体同时被诠释为道德的本体，存在与价值是具有本原性上的同一性的，因而存在的方式及其目的便应当是道德的。这一关于人的生存方式的当然理念，由于在宇宙论一本体论层面上获得与道体的相互契合与同一而转化为人道之当然的普遍性法则，从而成为人本身之生活世界的建构核心，同时也是价值世界的建构核心。

理学一哲学运动的完成时期，大抵说来，乃在南宋乾道、淳熙之际(12世纪中后期)。其完成的标志，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形成了三种不同形态的思想成果；二是确立了新的经典文本系统。所谓三种不同的思想形态，一是以朱熹(字元晦，号晦庵，1130—1200)为代表的“理学”，二是以陆九渊(字子静，号象山，1139—1193)为代表的“心学”，三是以吕祖谦(字伯恭，号东莱，1137—1181)为代表的“历史哲学”。“理学”重视天道本体之内化为人道本质的哲学诠释，关注人的生存本质在经验生活世界中发生异化或颓变的可能性，从而强调通过经验的道德践履来保证天道、天理或人性的实在性在生活世界中的纯粹表达。在这一视阈之下，生命过程被理解为一个向着其自身的存在本质，同时也是宇宙之终极实在境域的不断接近与回归的过程，并将这一过程视为个体超越其经验的生存状态而优入圣域的必由之途。“心学”则不仅重视天道本体之内化为人道本质的哲学诠释，而且尤为强调心体本身之实在状态所固有的澄明与至善。由于心体具有将其

自身的本质实在性表达于经验生存领域的必然性，因而对于心体之至善的澄明状态的内在认同与自觉切入，便不仅为主体性的具体内容，而且也为优入圣域的关键环节。心体之澄明的自觉顿达，即是对其经验生存之非本真状态的即时消解，也即是存在之终究实性的即时还原。所谓朱、陆之异，原非体现于其哲学的根本目的，而体现于其哲学方法或其哲学理论建构的逻辑行程，在实践意义上，则尤为清晰地体现于其终极价值境域之实现的不同途径与方法（所谓“工夫论”）。所谓“历史哲学”，我用以指称以吕祖谦为代表的“浙东学派”所体现的学术特征。尽管吕氏早逝，其学术思想的开拓未见其全量，其表达未见其抵止，因此其理论建构的完密性与系统性均较朱、陆为逊色。但另一方面，吕氏本人的学术素质与学术视阈却使他更多地关注社会历史的整体研究。他与朱熹一道，亲身参与了理学体系的哲学建构，二人合编《近思录》一书，实为理学确立了体用兼备的整体规模。但吕祖谦个人的学术路向，却以史学为根基，他与当时浙东学术群体中的主要人物，如薛季宣（字士龙，也作士隆，号艮斋，1134—1173）、陈傅良（字君举，号止斋，1137—1203）、陈亮（字同甫，号龙川，1143—1194）、叶适（字正则，号水心，1150—1223）等等，都有密切交往。并且，他亲身见证了朱熹与陆九渊之间的思想分歧与学术论争，对他们各自的学术主张均有深切了解。深厚的学术素养与丰富的学术经验使他有可能在整合朱陆、兼摄陈亮及永嘉之学的基础上又超越其各自的理论限阈，独辟蹊径，而将道的理论追寻推进于社会历史的全部领域，将道的现在状态与人类当前的生活世界相互联结，在关于道的自身存在的历史性即体现为社会人群之公共

生活状态的历史性这一宏观视阈之下，充分强调对于道的追寻与把握，必须诉诸典章制度的历史性变动以及人物的历史性活动，充分强调现实的历史与历史的现实之间的本质同一性，充分强调个体的道德世界与生活世界之间的本质同一性，从而在一种新颖的思想视阈之下实现了哲学与历史学的相互融合与通贯，在某种意义与程度上开创了中国学术史上的“历史哲学”传统。这一源于不同学术之视阈整合而出现的新学术领域，就其思想与观念的充分表达而言，其实也在更大的程度上代表了儒家原始精神的回归，而作为“浙东学派”的基本学术领域与学术精神，则代有传承，历有渊源，在思想史上产生了恒久而绵远的影响力。¹

上述三种不同的理论形态，在整体上均为理学—哲学运动所达成的思想成果，也可视为在不同的思想维度上对先秦原始儒学进行重建而实现出来的三种不同的理论形态。而就其最为直接的问题意识而言，则代表了关于“道”之自身存在及其实现途径的不同架构。就“理学”而言，道的自身存在与人的先天本质相同一，因此求道的过程与复性的过程是完全一致的，由此而展开的工夫论基本取向，则是由“后天”而复归于“先天”。就“心学”而言，则经验现在的个体，就其本原性而言，原是“先天”而取得了“后天”的生存样态。因此个体的本原性实在状态在经验世界中的即时呈现，即是“后天”而体现“先天”，“先天”获得了向“后天”的贯彻与落实。因此，确保“本心”在现实生活世界中的本原性表达，便不仅是求道的工夫，并且即是道的当下实现。就“历史哲学”而言，则道既被确认为个体人的本原实性，就必然同时体现为人之群体的本原实性，群体生活在空间—时间中的连续展开

过程，就应当被更为本原地理解为道的自身存在的展开过程。因此之故，要获得关于道的自身存在及其存在性之展开过程的实在性的真实领悟，诉诸群体之公共生活的历史性便无论如何都是必要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关于历史的研究，本质上即是关于道的研究，是关于道的自身存在及其自我展开在空间一时间之共相结构之中的连续性过程的研究。而这一关于道的历史性追索，既以道的当前存在状态为切入点，那么诉诸道之当前状态的所以然之故，包括群体生活之公共制度的过程性沿革以及作为历史存在的个体人的现实性活动，便是必要的基本方式。由此可见，上述三种不同的理论形态，皆以道体为世界存在的本原，但对道的自在相状及其存在境域的领悟则各有差异，因而对于道的追索方式及其实现路径的建构也各有差异。

标志为理学—哲学运动之完成的第二方面，则是指“四书”作为理学经典文本系统的确立。众所周知，《论语》虽在汉文帝时立于学官，《孟子》则旋立而旋罢，其性质仍为“传”而非“经”。《大学》《中庸》原为《礼记》中的二篇，汉代之后，《中庸》虽有单行而未称“书”，《大学》则似乎并无单行之本。然宋代自二程开始，表彰《大学》《中庸》，使之与《论语》《孟子》并列，至朱熹则确立“四书”之名。《四书集注》一书，实为朱熹毕生精神之荟萃，然该书之真正的重要性，是为理学这一儒学的新形态确立了基本的经典文本系统，并提供了关于理学基本问题的典范性阐释，由此而使“四书”得以与“五经”并列。历史上所谓“汉学”“宋学”之争，原始要终，窃以为实在于其各自所依据的经典文本系统原本有异，“汉学”以“五经”为主要阐释对象，“宋学”则主要以“四

书”为阐释对象。宽泛意义上的所谓理学，其哲学讨论的基本问题、理论依据、思想资源等等，主要皆来自于“四书”。理学的发展史，在相当程度上即体现为“四书”的解释史。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包括学术上的以及政治制度上的，上述三种思想形态在南宋以后的各自发展，虽其传承各有统绪，却并不平衡。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理学运动之最高成就的朱熹学说，现实性上则由于元朝廷祐元年恢复科举取士制度，规定以《四书集注》为试题及“标准答案”的来源²，逐渐成为学术界与思想界的主流形式。直至明代中叶，王阳明之学崛起于浙东，方始突破朱熹理学在守成的传承中所出现的僵化格局。作为宋代以来理学—哲学运动所实现的主要思想形态之一的“心学”，其重视心体之自我澄明的学术精神，非但得以重振于数百年之后，且其思想境界与实践境界均有更为宏大的开拓。王阳明以其广袤的学术胸襟，以“心即理”为思想基原，贯通“五经”“四书”，熔铸佛、道二教以及宋代以来不同学术形态之思想精义，兼综博汇，实集“心学”之大成。集中体现了其哲学思想的《传习录》一书，则成为足与《四书集注》比肩的心学经典。其影响所被，一时学者无不心目俱醒，风从响应，学术思想界也因此而别见一片疏风朗月的新天地。

虽然阳明先生的一生并不长久，但在他五十七年的生命历程中，却实现了中国古代文化所理想的全人格，集事业功德与立言垂教于一身，以“真三不朽”而垂范于史册。他是一位思想深邃的哲人，其学说的畅演与传播改变了明代中叶以后中国思想学术发展的整体格局；他是一位深怀韬略猷谋的将军，其事功的建立

实际上改变了明王朝的政治命运；他也是一位逸兴遄飞、文心奔涌的诗人，山川幽邃、天心月圆，都曾见证其潇洒的仪态与隽永的文辞。正因此故，虽数百年以后，人们犹思其功烈，想其为人，心生景仰而为之赞叹三复。如清代马士琼云：

古今称绝业者曰“三不朽”，谓能阐性命之幽微，焕天下之大文，成天下之大功。举内圣外王之学，环而萃诸一身，匪异人任也。唐宋以前无论已，明兴三百年，名公巨卿，间代迭出，或以文德显，或以武功著，名勒旗常，固不乏人，然而经纬殊途，事功异用，俯仰上下，每多偏而不全之感。求其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夺三军之气，所云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惟我文成夫子一人而已。³

但阳明先生的一生，其现实的生命旅程却是偃蹇困顿、充满艰险的。投荒万里，颠仆于尘途，征剿寇盗，削平宁藩，他所迎来的却是如瓦釜般雷鸣的谗言诟詈；抚平思恩、田州，征讨藤峡、八寨，安民人宁处之心，除国家百六十余年之患，师奏凯旋，却病逝归途。他的临终遗言，谓“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的确，除了那一片玉壶冰心以外，他似乎什么也不曾留下。然而，当我们徜徉于他的思想世界之中，回味与诠释他的良知之说，却无法忘怀其生活所经验的百死千难。阳明的生活世界，原是其思想世界的开展形态；他的生活践履，也原是其“致良知”学说的确切证件。原于此故，了解阳明的生活世界，便成为我们更为真切地理解其思想世界的必要前提。梁启超先生云：

居恒服膺孟子知人论世之义，以谓欲治一家之学，必先审知其人身世之所经历，盖百家皆然。况于阳明先生者，以知行合一为教，其表见于事为者，正其学术精诣所醇化也。综其出处进退之节，观其临大事所以应者之条理本末，然后其人格之全部，乃跃如与吾侪相接，此必非徒记载语录之所能尽也。⁴

依循任公先生此说，我们遂综理历代之所记述，参稽时彦之所研究，而请述阳明先生的生平行履于后。冀踪其生活世界的实迹，以见其思想世界的深邃，而踪其通达于圣人境界的曲折艰辛……

本章注释：

1 关于“浙东学派”问题，这里显然不遑多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作者的另外一些作品，如收入《宋明儒学与浙东学术：董平学术论集》（贵阳：孔学堂书局，2015年）当中的一些论文。

2 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十月，中书省上书言恢复科举取士之制。十一月，元仁宗下诏，确定次年（延祐元年，1314）八月“天下郡县兴其贤者能者充试有司”，延祐二年二月会试京师。又规定其“考试程序：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二场策一道，以时务出题，限五百字以上。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复以己意结之，限三百字以上。”陈邦瞻：《科举学校之制》，《元史纪事本末》卷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53册，第784—785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下引该丛书简称“四库本”。本书所引文献，第一次引用时标明版本、出版社、出版年份等信息，其后引用时均不再标明。

3 马士琼：《王文成公文集原序》，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中下册）卷四一，第1799—1800页，吴光、钱明、董平、姚廷福等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下引该书简称“《全集》”。

4 梁启超：《阳明先生传及阳明先生弟子录序》，《全集》卷四一，第1811—1812页。

目 录

导 言 / 1

- | | | |
|-----|------|------------|
| 第一章 | 泛观博览 | 止心圣学 / 1 |
| 第二章 | 投荒万里 | 龙场悟心 / 38 |
| 第三章 | 职事屡迁 | 门生广进 / 71 |
| 第四章 | 南赣戎机 | 矢石书影 / 96 |
| 第五章 | 翦除宁藩 | 教揭良知 / 182 |
| 第六章 | 讲学越城 | 心目俱醒 / 270 |
| 第七章 | 总督两广 | 恩威兼行 / 297 |
| 第八章 | 夫复何言 | 此心光明 / 366 |
| 第九章 | 哲人往矣 | 尔思曷兴 / 386 |

初版后记 / 401

修订版后记 / 403

主要参考书目 / 407

第一章 泛观博览 止心圣学

(成化八年至弘治十八年，1472—1505)

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自号阳明山人。明宪宗成化八年九月三十日（1472年10月31日）出生于浙江余姚。据说他的母亲郑氏妊娠十四月方始分娩，而在阳明诞生的当天，他的祖母岑氏曾梦见“神人衣绯玉雲中鼓吹，送儿授岑，岑警寤，已闻儿啼”，所以他的祖父便为他取名为“雲”，他出生的那座楼房则被称为“瑞雲楼”。¹

按照钱德洪（字洪甫，号绪山，1496—1574）等编撰的《阳明年谱》的记载，阳明的先祖为晋光禄大夫王览（字玄通，205—278），本为瑯琊（今属山东）人，至王览的曾孙王羲之（字逸少，321—379）始徙居山阴（今浙江绍兴）；至二十三世迪功郎王寿，则自达溪迁于余姚，遂为余姚人。²姚江王氏是显赫的文化世家，其祖上代有才人，门庭荣耀。阳明的曾祖父王杰（字世杰，号槐里子），“自为童子即有志圣贤之学，年十四，尽通四书、五经及宋诸大儒之说”³，其为人则“仪观玉立，秀目修髯，望之以为神人。无贤愚戚疏，皆知敬而爱之，言行一以古圣贤为

法”。⁴曾著有《易说》《春秋说》及《周礼考证》，又有《槐里杂稿》数卷，然皆不传。其祖父王伦（字天叙，号竹轩，？—1490），天性爱竹，于所居之轩，皆环植以竹，日啸咏其间，“视纷华势利，泊如也”，学者因称其为“竹轩先生”。“于书无所不读，而尤好观《仪礼》《左氏传》、司马迁《史》。雅善鼓琴，每风月清朗，则焚香操弄数曲，弄罢，复歌以诗词，而使子弟和之。识者谓其胸次洒落，方之陶靖节、林和靖，无不及焉。”⁵其父王华（字德辉，号实庵，晚号海日翁，因尝读书龙泉山中，学者又称龙山先生，1446—1522），在阳明十岁的那一年，即成化十七年（1481），王华登进士第一甲第一名，官至南京吏部尚书。王华为人耿介磊落，学问深醇，因得罪于刘瑾而被强令致仕。他退居于乡，虽无富贵荣华，却仍甘之如饴。深知其道德文章者当时传曰：

先生（王华）气质醇厚，平生无矫言饰行，仁恕坦直，不立边幅。与人无众寡大小，待之如一。谈笑言议，由衷而发，广庭之论，入对妻孥，曾无两语。人有片善，称之不容口。有急难来控者，恻然若身陷于沟井，忘己拯救之，虽以此招谤取嫌，亦不恤。然于人有过恶，亦直言规切，不肯少回曲，以是往往反遭嫉忌，然人亦知其实心无他，则亦无有深之者。先生才识宏达，无所不可，而操持坚的，屹不可动。百务纷沓，应之沛然，未尝见其有难处之事。至临危疑振荡，众多披靡惶恐，而先生毅然卓立，然未尝以此自表见，故人之知者罕矣。为诗文皆信笔立就，不事雕刻，但取词达而止。所著有《龙山稿》《垣南草堂稿》《礼经大义》诸书，《杂录》《进讲余抄》等

稿，共四十六卷。⁶

阳明所生活的这一家庭背景，对其少年与青年时代的品德素质与学术素质的涵养，无疑是有重要影响的。而在重视宗法的中国古代社会，其宗族的显赫与家族的荣耀，盖亦容易经其主观认同而对其思想行为产生现实的影响。

按照《年谱》的记载，阳明少时独具心慧，闻祖父诵书，即能默记，但至五岁时还不会说话。“一日与群儿嬉，有神僧过之，曰：‘好个孩儿，可惜道破。’竹轩公悟，更今名，即能言。”由此可知，阳明五岁前名“云”，至五岁时由其祖父改名为“守仁”。⁷而大概在此后不久，阳明的父亲王华因思念山阴山水佳丽，且山阴原为其先祖所居之地，因此又从余姚迁居到了山阴，居越城之光相坊。⁸

少年阳明聪慧颖悟，天真独秀，在其祖、父的关爱之下，自幼即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成化十七年，王华状元及第，授翰林院编修；次年迎竹轩翁奉养于京师，阳明遂与祖父同行，是年十一岁。《年谱》载：

翁过金山寺，与客酒酣，拟赋诗，未成。先生从旁赋曰：“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醉倚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客大惊异，复命赋蔽月山房诗，先生随口应曰：“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有人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⁹

这一少年赋诗的事件，不仅可见阳明的才思敏捷，而且其诗

境所表达的独特理趣，以及那种潇洒意态与高远宏阔的气象，则几乎在某种意义上预示了其日后的思想学术成就。

阳明的少年时期，大概是既充满灵气而又颇有些顽皮放浪的，既心胸豪迈而又颇有些落拓不羁的。其十二岁始就塾师，大概亦不能完全像有些儿童那样循规蹈矩，所以《年谱》称其“豪迈不羁，龙山公常怀忧，惟竹轩公知之”。¹⁰同样是在十二岁这一年，阳明最早接触到了道教的内容¹¹，自此“每对书辄静坐凝思”，并有了“读书学圣贤”的愿望。《年谱》载：

尝问塾师曰：“何为第一等事？”塾师曰：“惟读书登第耳。”

先生疑曰：“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龙山公

闻之，笑曰：“汝欲做圣贤耶？”¹²

对十二岁的王阳明来说，未必真能深领“圣贤”之意，但他既把“读书学圣贤”确立为人生“第一等事”，则表明他对自己未来的生命已然有了一个明确的期盼，圣人的境界成为他生命追求的目标。为自己生命的未来状态自觉地建立起预期目的，是即为“立志”。心之所在谓之志，志之所在，行必随之。事实表明，此后阳明的生活道路虽充满艰难险阻，可谓荆棘满地，但正是这一早年即确立起来的圣人志向，成为他克服种种艰险的内在原动力。

成化二十二年（1486），阳明十五岁，仍居京师。这一年的重要事件是他对北部边关的山川形势及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因此而有了经济世务的宏大志向。“先生出游居